# 接力改革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回眸



## 会议概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 关键词

### 解放思想

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 工作重点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为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 四项基本原则

在1979年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 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认为“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都用“一号文件”形式出台有关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历史决议

1981年6月27日－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被人们简称为“历史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了总结和评价。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 小 康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同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提出“小康”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 新时期是这样开始的

金冲及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全世界都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它，议论它是怎么发生的，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的顺利环境下开始的，相反，倒是在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迈出了第一步。

那时候，两大难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另一方面，还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形成一条全新的思路，为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非凡的战略眼光、智慧和胆略，很难在这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局势下勇敢地作出历史性的决断。

### 三中全会的前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经历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从危难中得到拯救。接着，中央抓了两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二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这两件事，都是应该做的，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前进仍处在严重的徘徊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多年来存在的“左”的错误，不敢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这个思想束缚不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好，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评价也好，都不能改变，中国便无法走出一条成功的新路，更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 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时期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负的中央领导职务。

邓小平没有豪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坚定有力而又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打开新的局面。

事情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邓小平断然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恢复工作前，他给中共中央写信，鲜明地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不只在理论上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立刻果断地付诸行动。恢复工作后，他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并且立刻作出一项重大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这件事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向无数知识青年重新敞开了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它震动全国，以行动对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了先导作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讲话。他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指导和支配的。事实证明，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便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要端，成为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的起点。

### 新时期基本格局的形成

邓小平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时刻，他经过深思熟虑，当机立断，清晰地绘制出一幅新时期中国如何前进的蓝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最突出的贡献是，冲破了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全会公报明确地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决地实行全面改革：“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要求实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努力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20多天，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进一步澄清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是非。但也有少数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作出了回答。他说：“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作为新时期基本路线指导思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很短时间内都已十分明确地提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辟出来的。

### 改革开放的开始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全面改革也有一个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改革的浪潮首先从农村掀起。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如陈云所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

为了使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应该怎么做最初并不那么清楚，在起始阶段主要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对外开放，首先在广东迈出较大的步子。广东地接港澳，又是重要的侨乡，一直有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传统。接着，设置经济特区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要给予特殊政策，使特区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深圳速度”对全国起了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了吸引外资，还允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79年批准兴办六家中外合资企业。对外开放，从决策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这段时间内还有一项重大措施，就是调整国民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经济工作中曾再度发生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错误倾向，要求“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想大干一番，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但是，十年动乱留下的问题太多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积下大量“欠账”，被严重打乱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管理工作有待重建和整改，经济增长的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做好准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好比重病初愈的人，不让他休养一段时间，恢复健康，就要求他跑步前进，没有不跌跤子、不出问题的。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其中着重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比较扎实可靠的基础上进行。邓小平在1983年3月说：“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三年多时间内，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容应对，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中国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顺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邓小平曾用十分概括的语言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走上这条新路后，中国人应该举着怎样的旗帜前进？这是放在中国各族人民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总回答，是邓小平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来的。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一面鲜明的旗帜。高举这面旗帜，就使十几亿中国人在前进中有了共同的明确方向。有如毛泽东早年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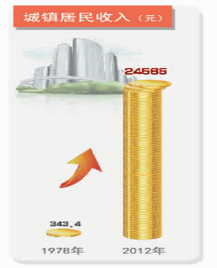
“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本世纪内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邓小平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1979年12月，他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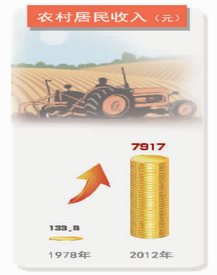
以往，一直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容易导致提出许多过高的指标。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状态”这个新的判断，规定了一个既积极而又脚踏实地、切合实际的基本设想。这就从根本指导思想上防止了重犯过去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实际国情而急于求成的错误。

这个基本设想在中共十二大上确定下来。十二大报告要求：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时人民生活就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一决策是符合实际的，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在20世纪末“翻两番”这个奋斗目标由此深入人心，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只有三年多时间。但人们看到：方向已经指明，目标已经确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此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前进，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亲历回忆

**铁瑛**（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次日，我回到杭州。在北京的这四十多天，我感觉经历的就像战争年代一样，是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王恩茂**（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细细想来，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最先是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但刚推行不久，就被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严重阻碍，给人们带来深重的忧虑。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我们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

一种被解放的狂喜，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督促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从未感觉到自己当时已是65岁的人了。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员）：

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的是，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的还有一点，就是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从1979年开始，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我感到全会是务实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此，结束了两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于光远**（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开始。全会没有举行开幕式，18日当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不再有什么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发言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他的地位和他这一讲话的内容讲的是党的全面的路线任务方针政策和组织问题，由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最后一天就是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的决定，然后通过《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上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而通过《公报》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选举结果，候选名单上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11位副书记。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摘编自《历史转折：1977—1978》

**朱佳木**（时任胡乔木秘书）：

通过亲身经历，我感到这两次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议题中途发生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然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召开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成立中纪委，而实际上却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的成果，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二是持续时间长。开始时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开20多天，结果，实际开了36天。因为工作会议讨论得相当充分，全会主要是履行手续，但仍然比原定3天延长了2天。这样，两个会共41天。

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畅所欲言，简报有周必录。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发简报等压制民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打破，越往后越活跃，大家的兴趣也越大。

——摘编自《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

## 时代记忆

###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1978年的一个冬夜，在饥饿的逼迫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村民秘密签订了“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刑（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18个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小岗村农民搞“大包干”的消息传开后，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甚至有人说小岗村搞资本主义复辟。小岗村经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在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下，小岗村的经验在安徽全省遍地推广。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1982年1月1日，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1981年底举行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国农村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熊 丽整理）

### 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市成立蛇口工业区，“立足港澳，领先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当年7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有着中国“改革试管”之称的蛇口工业区，尝试了许多个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并尝试民主选举干部；首次进行“工程招标”等。还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响亮口号。

可以说，蛇口工业区为日后的深圳经济特区进行了探路摸索。早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想在邻近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邓小平对此十分赞成。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正式设立。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经济特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熊 丽整理）

### 恢复高考——改变了社会价值取向

1977年寒冬，我正读初中，恢复高考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村12个20岁左右的知识青年欢呼雀跃地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有两位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全村人都奔走相告。他们离开村子的那天，村支书和上百个村民自发地将他们送出村。望着他们坐的拖拉机消失在乡道的尽头，我羡慕极了。

之后，我父母时常以两个知青的事迹激励我，我一直刻苦努力学习，期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1984年我参加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考上了湖南银行学校，成了村里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第一人”。父母感到十分荣耀，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家里特意宴请了同村乡亲。在我的影响下，之后的20年内，1800多人的小村子里有12人考上本科院校，有15人考上大专院校，成了全县通过高考跳出“龙门”人数较多的一个村。

高考，成为每个学子的命运转折点。从1978年春天29万高考学子步入神圣的高等学府，到如今每年录取五六百万人，为中国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百万计各类高、精、尖技术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第一批学子，今天已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整整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通过勤奋学习改变命运的社会风尚，形成了全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湖南省怀化市银监局 吴开伟）

## 人人都是改革受益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5个春秋，弹指一挥间，谱写了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惊天动地的华彩乐章。

35年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322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78年，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物资极端短缺，人民生活贫困。而当时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经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酝酿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等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提出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们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35年前，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断，接靠发聩——“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深远影响，已经随着实践的发展，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改革红利的受益者。

恢复高考政策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

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的红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星火。

乡镇企业、个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飞跃。

“辞职”、“下海”、“承包”、“个体户”、“万元户”……一个个当时的“热词”，镌刻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烙印。中国人以吊场奋发的朝气、开拓创新的勇气、一往无前的锐气，重塑着自己和整个国家的面貌。

当前，改革开放正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我们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敢于担当，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文/欧阳梦云 熊 丽

采编感言

本版采编人员 高 路 欧阳梦云 熊 丽 张 静